

饱蘸血泪话“水患”

陈自立 丁荣先等

一、民国八年内乡灾荒见闻

大雨下降，堂屋门口看不见厢房门口的人。屋檐流水，伸手可接一盆。瞩目一望，韩庄已沉没在汪洋大水之中。淹死的人沿岸各处皆有三四百人之多。

民国8年（1919年）夏秋之交，内乡连降暴雨，大小河沟，积水四溢。大雨之后，又微雨时降，继之密云滚滚，掠空而西。而后天气闷热，微风不动。据宿儒王鸿恩咏灾诗序所载：“民国8年阴历六月十日，彻夜大雨，十一日黎明，房屋鸡犬飘浮逐流，人畜纵横；淹死士、女百余人。”根据我所回忆：一个炎热的下午大雨下降，堂屋门口看不见厢房门口的人。屋檐流水，伸手可接一盆。如此持续约两个多钟头。继之中雨不停。入夜雨声大一阵，小一阵。我守在祖母身旁，祖母时时嘱我不要睡着，以应付非常的事变发生。好容易熬到天明，雨稍停，9岁的我心想野外不知要发生多大的变化，遂赤脚卷裤到村外看大水。我村西边二里许的湍河，呼呼隆隆的水声，清晰可闻，看大水

的人已有许多。瞩目一望，韩庄已沉没在汪洋大水之中，内乡数一大河的湍河，波涛汹涌，奔腾澎湃。一个飞浪从韩庄竹园和树林中出现，前浪未去，后浪又来，越叠越高，好似斩断的丘陵。及至赵家，河床稍宽，飞浪骤一伸腰，水向两边飞腾。一浪初息，一浪又来，水面杂以云雾。河西高峻的雁山，不可复见。赤眉街中的树木，房屋不能辨认。当第二飞浪横展两翼，冲向左右，有人高喊：“大水到西渠外啦！快跑！”看大水的人一哄而散。我回到家中，大雨又下了，祖父命令我们都进入砖房的祠堂里。我再无胆出外看大水了。雨时大时小，祠堂周围原用以防匪的土墙，一段一段的扑通扑通的倒下，门窗震动哗哗有声。当地雨水为湍河向东流的大水所阻，汇集起来，流向祠堂院里，越积越深，我祖父说：“不要怕，屋内的桌高三尺，人又高三尺，进屋的水不会有六尺深。”雨由大变小，渐渐停止了。10点以后，太阳露出笑脸，湍河的水不再向东泛滥，各家又踏着泥泞回了家。这时，人烟较多，所盖房屋，家与家之间有较强的流水道，房屋都侥幸还没有倒塌。

当时有人编了歌谣：“水到夏馆天未明，一下刮的溜溜清；水到急滩喝罢汤，一下刮个溜溜光。”大水在5点左右到夏馆，晚上9点到邓县的急滩。在18个钟头的时间内流程240华里。

当大水来时，夹杂大量树木，房屋檩条、家具顺流而下，还有一些麦秸垛，一湮一湮的随水漂流。淹死的人沿岸各处皆有，以夏馆一带最为严重，据说有三四百人之多。赤眉东北韩庄马天迟，被水冲走，幸遇一树，抓住树枝，将发辫缠上，漂流数里，冲至河边，得免于死。大水过后，两岸遗尸累累。

水流最大时，被水淹没的地方东至小王营，西至赤眉寨墙根。内乡城东湍河一只渡船，牵绳拴在花园路南高崖的槐树上。水宽东至白冈，西至顶水庵，城南东至符营，西至疙瘩庙，相当于黄河的流量。两岸良田水冲沙压者无算，仅赤眉东边稻田积沙，农民移置成大堆，经29年才迁运完功。鱼贯口，韩庄的

稻田，原为赤眉肥沃之区，大水前稻谷亩产常在 800 斤以上，大水剥去表土，遂致减收，至今仍未恢复原状。

赤眉的福山寺南潭营、杨营、小河一带受灾更为严重，房屋淹塌甚多，夏收小麦淋雨霉烂，大户王希孔出粮赈济，并将其竹园砍伐，为灾民筑房屋。

湍河水患大抵如是，而内乡境内的老灌河、默河及其他大小河流，冲毁良田若干万亩，毁坏房屋、淹死人畜又不知凡几。据称为明朝成化以来仅有的大水。

民国 9 年，夏季因去年的大水冲刷表土，农田瘠贫。小麦亩产 100 余斤，生活所需，多指望秋季玉米。麦收后下了雨，玉米苗长大以后，终日烈日炎炎，万里晴空，星雨不滴。玉米豆类，颗粒未收。秋季人们以干红薯叶和藜藿为食。种毕后，因镇平收成较好，贩卖粮食，云集于马山口。于是农民变卖家具什物，换得一点粮食。赤眉街的粮行除逢集除粮外，总有中年妇女、老太太各持笤帚、小簸箕，争扫买粮洒下的几粒粮食，争抢不及，常致斗殴。

卖家具买粮食，只能维持一段时间，而这之后只能靠剥榆树、梧桐树皮，碾碎炕烙当馍吃。许多家庭扶老携幼逃往镇平的清化、穰东讨饭为生，甚至卖儿鬻女。陈营陈双成将三儿卖于清化某家做螟蛉；陈宗雨瞒着姐夫，携其姐卖于穰东某人为妻；小学教员陈定基到镇平讨饭，因大雪刺目，回家数月不能看书。

春天到了，野草成为人们的主食，柳叶绽，榆钱结了，又成为农民的较好食品。陈营中一株大榆树，陈麻康腰插斧头，爬到树杆上，将碗粗的榆树，叮叮的砍下，树枝噗嚓一声歪下来，树顶端先着地，陈同宽的女人疾行前往争拉榆钱，树枝根端倒下恰好打在她头上，立即毙命。

榆钱由青变黄，人们每日上树采摘为食，所有粪缸都充满了没有被消化的榆钱。

10年春，歹民多由一人为首领，黄昏后在郊野“对码子”（用暗号集合人），各持刀斧，去抢劫稍有存粮的人家。有些人无奈，将一点粮食装到夜壶中。

（陈自立）

二、洪水泛滥如是说

六月初四，乌云密布，大雨如注，连续三天不停，但无雷电，人称之为“海雨”。晚时只看到黑云更重，在槐树关的河泰山庙的山腰出现了黑、蓝、红、黄的云雾围绕山腰，不多时听到水声巨响，水头下来了。江中有眼如灯笼的怪物，乘水奔流。

旧均县城为蛤蟆形的建筑，濒临汉江西岸。其东大门为蛤蟆嘴，左上水门，右小东门为眼，背靠西岗。东南低，西北较高。东南门城墙高约三丈多。

在民国 24 年（1935 年），我年已 18 岁，记得在农历六月，阴雨绵绵。至六月初四，更是乌云密布，大雨如注，连续三天不停，但无雷电，人称之为“海雨”。这时，汉江水汹涌飞涨。至初五，水已平堤围城。次日洪峰达最高点。到初七，江水不涨不退，夜晚水开始消退，而且消得很快，天亮水位已降到堤下。

原在初四日下午，江水虽涨但水位尚在堤下。晚些时，据槐树关居民徐凤英亲自目睹洪峰来时的情况说：“初四晚时只看到黑云更重，在槐树关的河泰山庙的山腰出现了黑、蓝、红、黄的云雾围绕山腰，不多时听到水声巨响，水头（洪峰）下来

了。水势凶猛，像丈余高的陡墙横江而下，非常吓人。我定过神来，才知水已进屋。我奶奶的鞋已被冲走两尺多远。我们急忙到山坡高处邻居家中。次日，我站到坡上看到满江尽是柴草、桌凳、木板和树木，随水翻滚奔流。还有一个人骑在大树杈上，一个巨浪冲压过来，树翻了个身，人却不见了。沧浪亭脚下的‘孺子歌处’四个大字尚能看到。”城内居民丁锡福说：“初六日，我戴上雨帽在城墙上看涨水，这时水已淹没大东门洞，叫人心惊胆颤。如城墙稍有裂缝，全城人的性命都要完了。江面是黄汤似的江水，如野马奔腾，除浮流着柴草树木外，不时有牛羊牲畜和人顺流而下，甚为凄惨。”

初五日下午水已围城，当时保甲人员或居民群众组织抢堵城门的进水。驻均师管区也有些人参加抗洪。先堵东南门，上水门下午晚些开始抢堵，采用强收一切能堵水的物资堵水，如被套、被子、棉花、布袋装上土堵水，南城门并强收富户粮食装麻袋抢堵。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大家也就不能说个“不”字了。这样一来，水总算被堵不能畅通进城了，但江水顺着城墙修建的出水洞倒灌入城，加之所降的雨水积聚不能流出，地下水也不断冒出，城内水位仍然在上涨，西门内的池塘院有二尺深的水。

初六日，水势严重威胁着大东门和小东门，水位有五到六尺。上水门内地势稍高，水约四到五尺。南门水深约五尺，北门水才到外城门外（北门是内外两道门）。西城门是用土填实的，虽还无水，但所填之土已出现破缝渗水现象。大东街的商人都漂了铺板为排以备万一。大东街左右的横东街、红墙根街均都水深二到三尺，也有部分居民用自家的门板漂排的。净乐宫门口已水深尺余，只有后营街、北门街、学宫场和净乐宫内无水。

商业区的南门外南关大街，更为惊心动魄，大街已成为河道，船只可自由航行。老妻张国粹就是当时被水困于楼上的人

(位于大街中部校场口)她目睹水情说：“在初五日早上水已进街，涨得很快，不多时水已进门，我的叔父等人看到情况危险，急忙将铺板门擗成排用绳拴到房柱上。下午水离楼只一尺多了，幸在上午已将衣被、箱子搬上了楼，并将干面条拿到楼上。虽然离水很近，但浆水不能吃，只有用盆接房檐雨水将就做饭。这时街南头的居民有的坐船到对岸龙口镇，有的坐船到西岗，有的坐船到北头高楼上。住在南头的表姑、表妹是到我家来逃水的。南头有些大资本的商号如德源、源丰、德和福、德盛昌等均有船只停于门前，以备洪水上楼时逃跑。一般商户，只能做门板擗排的准备。街上所有门板都被利用，满街漂流着木器等物，人心惶惶，也无人打捞。我们困在楼上的八九个人两天只吃了两顿面条。初六，韩家隔墙孙姓邻居（儿子孙云霖后是个教师）的住房矮些，水淹上了楼，房子要塌了，大喊救命。幸我家楼上山墙上有一窗户，喊他们爬上房脊翻窗过来。他们刚进我家自家房屋就倒了。”

事赶的巧，薛家表姑临产，使人更添一分焦急。幸好七日晚，洪水退了，只有在泥糊上支铺，生了个女孩，取名叫“荒难”（现为教师已退休了）。

据家住西岗石河庙脚下的族侄媳说：“初五夜，洪水到了我家，我们跑到山顶上避难。听山顶上的人说，器川塘已水深二三尺了。水退后回来看我家墙上的水印足有半人高。”

离城 40 华里石板滩的徐老人说：“约在初六的中午，听说水要涨上来，没等我们午饭吃完，有人在喊，‘水上街了！’出来一看，水已到了街的北头，很快就涨到了街中间。这时大桥淹了一大半，小桥已淹完了，但桥南街尚未上水。有幸水到桥北街停止了，第二天水就消了。”

街房丁奎先对我说：“那时草店街曾被淹，因汉江涨水流不出，水位上升不断。草店北面的草房街已进水一尺多深，河街亦有水。”

花栎树的权老人说：“好几天的大雨，六月六的山洪暴发，水

头来势凶猛 风雨交加 山崩地裂的 我的房子都被冲走了。”

我家居住县城上水门。当时家父远出，母病故尚停柩室中，家中只我一人，请一老人作伴。六月初五日下午，保长和群众在抢堵上水门城门。保长正喊着居民要大家自觉将家中能堵水的东西都拿出来堵水。也有人直接到屋里强拿旧棉被套等用来堵水。晚时将城门堵好了，但城门洞内有一尺多深的水。我家门前尚无水，我认为不甚要紧，谁知半夜床下泛出水来，淹没了脚背。我惶恐不安，出了大门，门前水已深约尺余，淹了小腿（因房屋地基比街要高）。我跟老人顺红墙根街向北走到北门街他妹家住。初六日，我跟着看水人群一道由北门道上城看水。上得城来即闻水声隆隆，如同雷鸣。江水翻花大浪，一阵一阵漂流着树木、杂草、家具等物。北门城外水尚未进城门，离城门约数尺远。离城不远的陈士美坟已上了水，石人石马已淹了。我沿着城墙来到上水门城上，看见我家房屋四周已在水中。我家房子墙脚是用顽石砌的，有四尺高，上半截用土砖砌的，幸水未淹完墙脚，否则房屋必然倒塌。极目远望均草公路，已成汪洋泽国。土桥的大炮山、小炮山已成孤岛。看水的人说：山洪暴发多为夜晚，人尚不知就被洪水冲走。这次水涨得猛，上游一定走了蛟。有夜间看水的人说：曾在昨夜看风江中有眼如灯笼的怪物，乘水奔流。初七日晚水消，而且消得很快。初八日水已落到堤下。我回到家中见卧房水印有一尺多高，母亲灵柩淹了小半截。幸而床上未上水，卧被还是干的。惟桌下竹箱子的经书、琴谱、碑帖等均被水泡坏，甚为可惜。

水退后，我到街上看看情况。所有被水淹的街道尽是泥浆，商户都在铲除淤泥，清洗、整理铺面。此次涨水城内商户无大

损失，城外商家损失较为严重。据说大酒商号“源丰”，涨水时因运酒上楼转入大坛吸了灯花到酒中而引起火灾，楼下是水，楼上是火。城南头矮平房多有倒塌，我老妻娘家后宅的碾磨房也已倒塌。

均县当时的县长华文选，当水围城后群众向县长建议祭江退水（均县有这样的习俗。上水门城上建有杨泗庙，神像是小孩子。传说以往有一次，也是涨水围了城，县太爷将亲生儿子投入江中祭了江，江水退了，救了全城人的命，人民感激他，给他修庙塑像纪念他。解放前香火天天不断，年节敬杨泗的人很多，尤其是走江河的船民非常敬重。华文选对群众的建议迟迟不肯答应，有的人被激怒了大声吼叫。县长见水势凶猛，实无别的办法，只得听从群众意见。初六日备了猪羊香裱，敲锣打鼓，县长亲自登上南门城墙的魁星楼祭江，行礼毕将猪羊和县长的衣帽抛入江水中，以表示县长投了江。说也巧，次日雨停水稳，消得也快。也许是洪峰到了最高峰要回降，或是汉江下游打了口子的原故。

洪水之后被水淹的农村损失很严重，城市过水的房内很潮湿。我家在地上垫了几块砖石走路，直到秋天霜风起了，房地才渐燥。我因常住潮湿屋内，生了疥癬疮。

灾后，当时的政府亦未有拨款、募捐、防病及赈灾等举动。

因事隔年代久远，经访问多人，均只知其片断情况，今将其整理到一起，记之。

（丁荣先^①）

^①丁荣先，现年 78 岁，解放前曾在均县民众教育馆任职，解放后曾在均县一中和均县师范任教，现已退休。

三、襄阳大水亲历记

六月初，连下大雨，汉水暴涨。初五日晚上，突然有群鼠互相撕咬，闹得整夜不安。次日早晨，只见桌子上、窗子玻璃上溅了很多鼠血，这是不祥之兆。

民国 24 年（1935 年，农历乙亥年）我 12 岁，随父亲在樊城读书。父亲是私塾教师，学馆设在桂家三房（桂子光家），上半年由隔壁桂家五房（桂永丰家）管饭。

是年农历六月初，连下大雨，汉水暴涨。初五日（公历 7 月 5 日）夜里，突然有群鼠互相撕咬，闹得整夜不安。次日早晨，只见桌子上、窗子玻璃上溅了很多鼠血，父亲认为这是不祥之兆。

初六日上午没有下雨。吃午饭时，人们议论纷纷，说河水大浪大，很有出岸的可能。饭后，父亲带我和几个同学从后门出去，登上城墙，只见城壕里的水已经平了岸，迎旭门旧城门（已封闭多年的废门）口的桥板也已挨着水了。由于水的涨势缓慢，人们不大担心，有的人还在四平八稳地捞浪柴，根本没有想到随后到来的灾祸。

我们从城墙上走到矾头，这里濒临大河，河水冲击着矾头脚下的石块，响声震耳。站在矾头向南向东望去，但见一片汪洋，茫无边际，巨浪翻滚，真像小山岭一般，令人触目惊心。

这天是星期六，傍晚放学后，我到梯子口去看了一趟，这时迎旭门、铁匠街都已上了水，有几只小船停在梯子口避浪。

晚饭时，开始下起了大雨，一夜不歇。这些日子里下雨有

两个特点：一是不刮风，二是不打雷。晚饭席上，主人桂永丰说：“老河口今天发来电报，说是有很高的水头下来，要樊城作准备。我看不必要，民国 10 年的大水只平了我家门口的石条，这次的水不见得更大。”在座的客人詹某是桂永丰的内弟，宜城县孔家湾人，当过军官，阅历较多。他说：“根据我们宜城县的经验，今年的这种气候有猛涨大水的可能，最好早作准备，不可大意。”

临睡前，父亲翻阅了一会《襄阳县志》，查了一下襄阳历年涨水的记载，然后将房里的东西略加整理，准备逃水灾。

初七日早上天还没亮，突然人声沸腾起来，父亲急忙把我叫醒，我们开门一看，只见天井院里的水已经平了阶沿石。这时暴雨还在下泻，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城外灾民的喊救命声。父亲毫不迟疑，迅速将上百口书箱搬上楼去，我只能拿一些小物品上楼。桂家三房全家都忙着抢运物品上楼，学徒们气力大些，首先搬了七麻袋米，然后搬了一个缸灶，又搬了一些木柴，还弄了一些炊具和瓷碗，解决了吃饭问题。

桂家三房的房屋有 40 多间，我们住的这一片有 11 间，楼上都空着，只有两个小仓装有半仓芝麻。父亲把被子放在芝麻上，占据了一个小仓。主人一家在另一片 8 间房的楼上，两片房屋有门相通。

折腾了两三个小时，天大亮了，雨也停了，主人家喊吃饭，我们这天早饭就在三房吃。水涨得很慢，这时屋里的水只有尺把深，我们还能坐在凳子上吃饭。饭后把碗一丢就到处乱跑，我看到地面处处有气泡咕咕嘟嘟向上翻，用脚踏时脚板被气泡冲得痒酥酥的，觉得有趣。又看到一块门板漂在水面，便坐上去当船划。回到有地板的教室，我还和平时一样大踏步走，没想到有的地板被水鼓起来漂跑了，因此跌了一跤，衣服全被水湿，父亲忙拿了干衣服给我换上。

随后，我忽然想起了隔壁的桂家五房一家不知怎么样，便

独自一人从后门溜出到五房去看看。五房也是人人忙着搬东西上楼，见了我就喊我去帮忙，我又帮这家拿些家具上楼。突然，我发觉水涨的速度加快了，心里非常惊慌，赶紧往回跑。穿过五房的三道院子才出后门，水已挨着我的屁股。进了三房的后门，水已齐我腰了。三房院子里漂了很多圆木橛，我得一根一根地翻越，连跌几跤，衣服湿透，又冷又怕，好不容易穿过三房的三道院子，挣扎到了楼梯口，水已漫过我的胸口。我精疲力竭，爬不上楼梯。这时人们全都上楼了，父亲在楼梯口已等得万分焦急，见了我，一把拉住拖上楼去，脱去我的湿衣，将我按在被子里。

当我上楼的时候，暴雨又下起来了，天气特别冷。桂家三房的管事先生江光选想起了喝酒可以御寒，忙派学徒杨守正去找酒坛。杨守正用门板做成木排浮在水上，不料人上去就压翻了。正在无计可施时，酒坛自己漂到楼梯口来了，这是因为坛里酒不满，并且酒比水轻的缘故。大家喜出望外，捞上去就用碗舀着喝。

我在被子里睡了片刻，精神复原，穿上棉袄跑出芝麻仓。这时雨仍下得很大。忽听得房子上有妇女和小孩的哭声，这是桂家后门外单家院住的一些小户人家，从房子上逃来，受不住雨淋而悲惨的啼号。于是楼上的管事先生和学徒喊他们从房子后坡掀开了两沟瓦，下面用长凳顶掉一根椽子，又靠一个小梯子，才使得房子上面的二三十个难民都下到了楼上。

过了一会，突然从房子上揭瓦处顺着小梯子又跳下来一个陌生的青年汉子，一问才知他姓牛，住定中门外汽车站附近。他们母子二人坐在草房上顺水漂流了数里。单家院子北面一段城墙被水冲开了十几丈长的一个缺口，他们坐的草房从缺口流进城里。他爬上了墙，又从房子上来到这里，可他妈却顺水漂流走了。桂三房主人拿了一条旧毡毯给这个死里逃生的青年披上，又有人舀了碗酒给他喝。起初他凉得似乎痴呆了，喝酒后

身体发暖了，便纵声大哭，不断喊着：“妈呀！你在哪儿呀！”全楼人为之凄然。

这时我才明白，为什么那阵子水涨得特别快，差一点把我淹死，原来是城墙被水冲破时城外的水向城内灌得很急之故。

水涨到 6 尺（即 2 米）深以后，涨速开始慢了，我们教室门上挂的“樊城同仁私塾”牌子成了“水情标志”，人们不断传呼：“淹住‘私’字了！”“淹住‘仁’字了！”中午，只剩下“樊”字，屋内水已有 7 尺深。据襄阳水文站记载，这天的最高水位是 70.35 米。

水深了，不断听到房屋的倒塌声。街上商户的房屋挨得很紧，不易倒塌，倒的多是街外独家独户的平民房舍。我在楼上窗洞里，亲眼看见距我只有几丈远的一座房子倒下去，可能里面没有人。中午时分，有一次较大的响声，我们那座房屋也有些震动，这是鹿角门城门上的跨鹤楼塌了。

晌午时分，我们便在楼上用浑浊的水煮稀饭吃。因为缸灶小，只能一锅又一锅地接着煮。全楼有 50 多人，规定每天吃两顿，每顿每人两碗，醋蒜瓣是惟一下饭菜。吃饭有碗没有筷子，大家都用当柴烧的木片代筷子。

下午雨停了，人们纷纷顺着小梯子爬上房子，又到晒台上向四处看。我人小，只有抱住晒台柱子站在栏杆上才能看到城墙上和城外。

水还没有淹住城垛，城垛上骑着些人，大浪打来还可能被浪卷走。城外村庄的房子完全淹没了，有些人骑在大树的桠杈上，不停地发出凄惨的喊声：“划子！救命啊！”这时城外巨浪滚滚，根本没有船敢冒险去救人。水里漂流的物体不断出现：草房、柴堆、牛车之类都有，翻滚着的白铁煤油箱也看得见，只是漂流的人畜看不清楚。

从城墙溃口处流进城的水分头乱窜：一股向财神庙一带西流，一股从当铺街后面向西南流，一股经东升巷向梯子口南流，

一股顺城墙根东流。流进东升巷的水过了玉皇阁又分一支由迎旭门老城门旁边的火场（民国 18 年火灾烧的）折向东南流。这个分流处住有一家姓杨的，老汉叫杨瑶，卖纸烟兼卖青货（蔬菜），和我们住的房仅只隔着东升巷。东升巷来的水把他家的墙冲倒了，他拿一根竹篙站在楼上，见有箱子这类的物件流来，用篙子轻轻一拨，流来的物件就进入他家。他爱喝酒，看到我们这边小窗洞有人，他就大声叫喊：“有酒吗？”他要求拿菜换酒。他在篙子头上绑一个篮子，装了一些茄子、辣椒送过来，这边用茶壶装酒放在小篮子里递过去，这种患难中换物饶有风趣。

从小窗口，我看到顺东升巷流来一头猪、一匹马，都爬上了老城门。老城门是迎旭门的古城门，上无城楼，满是荒草。猪、马在城门上啃草吃，草吃完了又啃漂来的一床桃秆（高粱）箔子，两头牲畜居然活下来了。

夜里，人们都不敢放心睡觉，害怕水涨上楼来。半夜，听到城外有敲铜器声，有人判断这是为了呼救，有人判断这是为了赶狼。

初八的一天，雨时下时停，水涨得缓慢，浪不大，屋里水深达 9 尺。下午，水基本上稳住了。据襄阳水文站记载，本日的高水位是 70.60 米，是历年的最高纪录。这一天，人们不像初七日那样紧张，都觉得闷倦，白天睡觉的人多，雨停时多爬上晒台去看看。夜里，雨完全停了。

初九日早上没有下雨，水有消退迹象。早饭后，我又爬上晒台，那个姓牛的也跟着上去了。他看见不远处一座房子上站着——一个他的邻居，也是水漂来的，他忙问那人看见他妈没有？那人告诉他，他妈已爬上了福音堂的房子。他很激动，立即从房子上向那人爬去想找他妈。临走时对我说：“小兄弟，你跟掌柜的说一声 这条毯子我带走了。”

上午水退得很快，9 点钟左右，水只剩两尺深了，人们都有

说不出的高兴，不等水退完都下了楼。我趟着水先到自己的住房看了一下，又上街看了一会儿。10点钟左右，天晴了，水退完了。房屋里因有门槛拦住，水流不完，只好用脸盆往外舀，我边舀水边捉小鱼，颇觉有趣。

水淹后的屋里，墙上、地面、家具上满是黄泥，一时没有清水冲洗。这种泥似乎含有很浓的胶质，以后用清水冲也难以洗尽。父亲在墙上挂的字画全看不见墨迹了，我读的四本《诗经》粘连得像一块砖头一样，床上的白帐子变成了黄帐子，所有的地面都积有半尺深的稀泥巴，一时无法清除。

下午，父亲带我出去，走了前街、后街、后沟（今定中街）等处，探望了父亲的好友王永承、罗茂林、赵裕兴等，各家都平安。据我所看到的，前街的湖南馆附近水较浅，只有3尺多；后沟中段水深约5尺左右；其他街多为七八尺深，有的超过1丈。鹿角门街最低，高房子也只剩得屋脊。各街都没有看到倒的房子，也没有看到淹死的人。街边有时见到剩下的猪皮，可能是船户丢的。

我和父亲从定中门登上城墙。樊城城墙外层大部分是用三合土夯筑的，城垛用火砖砌成。这次大水，城墙的外层多处塌了，土筑部分较厚，多数未坏。城上满是灾民，他们都是城内低洼处的贫民，他们的房屋有的塌了，有的还泡在水里，无处栖身，无可奈何，他们不得不露宿城墙。

走到鹿角门（即屏襄门），只见原来耸立在城门上的跨鹤楼不见了，城门洞塌了三分之二，只剩楼后一堵短围墙和墙后的过路道，围墙边的一棵老百日红树尚存。父亲向人们询问跨鹤楼倒塌时是否伤了人，答说在楼塌之前先有一次震动，老道士将楼内灾民统统赶出去了，所以没有伤人。鹿角门口偏东侧的地面陷了一个约1平方丈（约9平方米）的洞，深约两三丈，人们谣传说洞里有个“白蛇精”跟水走了。

城上到处有哭声。在强烈的阳光下，城外居民有的哭着寻

找亲人尸体，有的抬着尸体在泥里掩埋。无人认的尸体随处可见，城墙根处有一张漂来的床，床上一个死者在被子里盖着。鹿角门以东到财神庙之间是一片低洼地带，渍水很深，水面上浮着无数尸体，大人小孩都有，有的全家死在一起，手腕上有绳子连着。财神庙的房子上架着一口漂来的棺材，后来被拍成照片在《襄阳报》刊登过。财神庙以东到城东北角一带渍水也很深，这里没有住户，只有从别处漂来的少数死尸。

被水冲开的那个城墙溃口很宽，城外的水还在从溃口处往城内流，水的冲击力还很强，我们只得走下城墙，从离溃口较远的浅水处涉水过去。随后我们穿过单家院子回到桂家三房。

初十日早饭后，我和父亲离城回家。出了定中门，又过汽车站。车站西门口的公路上，有一大片死尸横七竖八地躺着，殷红的尸水伴着泥里渗出的水缓缓地向路旁沟里流，尸体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。白骨庙后的公路边，一棵大树倒下了，树枝间夹着一具死尸，头还埋在泥里。

走这段路时，有个青年人跟着我们，听口音像是河南省人，自称是去王家塘看望妹子的。父亲怀疑他是坏人，怕他路上行劫，紧张地注视着他。走到七里桥，从后面来了族兄卓直文和他的一个同学，父亲才放心来。那个陌生人随即离开我们向西走了。

直文哥在襄阳城内读书，穿着一身白色的学生装。听他说，涨水时襄阳城六门紧闭，水没进城，但人们坐在城垛间可以洗脚，情势万分危险。水退后城墙和河堤崩塌多处，要是再涨水就难以招架了。

我们一行四人过了七里桥，没有按老路走，因韩家洼一带地势低，路上水深，于是改走邓城、麇战岗、贾马家才回到卓家营。

我们卓家营比樊城地势高，村内一般水深两至三尺，有几家屋里才没到一尺深的水。村民的房屋大多数是土砖墙，倒塌

的多，幸未伤人。只有东营一个青年因喝醉酒跌倒在村外被淹死。

我家的房子塌了两间，堂屋的水约有一尺八寸深，墙上的土砖有三寸被水泡坏，粮食全部被水浸泡了，全家人逃往邓家冲我外婆家，水退后才回村。

这年蚕豆丰收，水灾过后，几乎家家都吃出了芽的蚕豆，边吃边晒，发了霉也吃，因此生病的人多。

我和父亲两人花了十几天的工夫整理了塌坏房子的木料、砖瓦，砌了两条简易的围墙，补了各处被水泡坏的土砖墙。我天天和砖头打交道，手指磨出血来，随后又病倒了。父亲只好将我留在家里，他一人去樊城教学。

洪水后的瘟疫很大，死了一些人。除因饥饿致病外，露宿也是致病的根源。我家附近的卓直兆的房子塌了，天天露宿，不久病死。邻人卓直义的女婿詹某是施官营的人，也在水后露宿病死。樊城人露宿者虽然少，但病死的也仍然很多。父亲的友人王永承（裱画工）、罗茂林（裱画工、画工）、王敬先（塾师）、谢映堂（塾师）、孙守仁（塾师）等均在此时病故。

我在家病了两个多月，病愈后父亲带我去樊城。这时韩家洼一带路上还有水，我们只得从张家村后沿沟堤走。堤边还看到一具死人骨骸，上半身浸在水里，下半身靠在堤旁，是一个小脚妇女。洪水中，有些人漂流到很远的地方尚能生还。樊城梯子口码头有个年老的搬运工人，抱着几根椽子漂流到宜城茅草洲以后讨饭回樊城。还有些人漂流到本县的大旺洲爬上了树活下来了。

这次大水，有的田地覆盖了一层淤泥，比以前肥沃，有的田地覆盖了白沙，不能种植。柿子铺东、西各十里内，大片大片的良田被沙覆盖，尤以柿子铺与施官营之间盖得最多。后来这一带的农民花了上十年的时间才把土翻上来，把白沙埋下去。

水灾后，政府虽也发放了一些救济粮款，但数量极少，杯

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在我的家乡，每户只领过几升稻谷，只能做得几顿饭。广大灾民主要靠自己生产（如种荞麦、胡萝卜）和借贷来度荒。农民虽经洪水无情的折磨，但很少逃荒讨饭的。

秋后，省立襄阳民众教育馆编印的《鄂北民众》第九、十期合刊中载有这次水灾的调查统计：全县淹没面积 2501 平方公里，受淹人口 4.2108 万人，淹死牲畜 3.9614 万头（一说为 5.6 万头），全塌房屋 5.0021 万栋，樊城城内 76 个保共淹死 4177 人，淹死牲畜 1839 头，全塌房屋 614 栋，冲坏房屋 481 栋。其中损失最大的是第一五八保，淹死 298 人，淹死牲畜 192 头，全塌房屋 164 栋。

这次大水，是襄阳县两三年中最大的一次天灾，它使本县农村元气大伤，难以复原。两年以后，又遇上抗日战争，使农村经济更加凋敝，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得以复苏。

（卓坤）

四、草市大水剪影

猛然抬头望见沙市，全镇电灯光明耀如白昼，想到那电灯光下的葡萄酒杯，陶醉在大饭店的阔少们迷恋着醇酒与少妇，真令人恨入骨髓。这近在只咫的灾民，你们在电灯下安住的沙市人们，都不想法救济么？那时我要是能放毒瓦斯，一定要将大量的毒瓦斯放出，来毁灭沙市

端午节过后就小病了的，我，医生嘱咐要住在空气流通气候干燥的地方。屋子本是复杂而潮湿的，因病的袭来，当然要想办法解决住的问题。干燥当然楼上较好，空气流通呢！在原有窗